

# 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

朱敏彦 杨森耀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是在国际友好人士倡导下,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产生的。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战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之誉。

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人经过反复酝酿后,在一次“星一聚餐会”上,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当即得到全体成员一致赞同。1938年4月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成立,公推艾黎负责召集。设计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于同年5月,写出了一份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业合作社的计划。这一计划行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赞许,更得到了周恩来、博古和宋庆龄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经过各界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孔祥熙出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8月24日,经过卢广绅等人的努力,宝鸡的十几个打铁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合的第一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此后的3个月内,就有80余个小工厂在西北地区建立。工合率先在宝鸡和西北地区的迅速发展,表明组织工业合作社的计划是适应抗战形势需要的。接着,各地也纷纷办起了工业合作社。1939年初,工合总会已设立了西北办事处(陕西宝鸡)、西南办事处(湖南邵阳)、东南办事处(江西赣县)和川康办事处(四川重庆)等四个区办事处。

工合运动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得到蓬勃发展。1939年初,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这是工合在解放区设立的第一个事务所,短短几个月中,延安地区就建立了15个合作社。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工合运动的深入进行,特别是为了适应解放区和游击区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1940年到1941年,工合总会下设各区的办事处进行了调整。西北地区的工作范围限在陕、甘两省,另设晋豫区办事处(河南洛阳);东南区限在赣、闽、粤三省,另设浙皖区办事处(浙江兰溪);西南区则为湘桂区办事处(广西桂林)和滇黔区办事处(云南昆明),川康区仍维持原状。经过调整,工合大区一级的办事处从4个

发展到7个。这样,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便一路从东南敌后游击区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蒙古高原直至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6月,七个区共计1595个合作社,22680各社员。每月生产总值达24022944元(法币),社员股金5645558元,总会和银行贷款1572857元。<sup>①</sup>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支持。为了推动工合运动进一步发展,经宋庆龄倡议,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尔后,宋庆龄又派人到世界各地建立工合推进委员会。从此,工合运动得到了更多的国际援助。

工合运动的开展,对于战时经济建设,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工合运动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及时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支援了长期抗战,成为战时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抗战前夕,中国新式工业十分有限,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工业集中在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东南地区及沿海沿江一带。其中仅上海一地便聚集了全国民族资本工业厂家的50%、资本总额的40%和产值总额的46%。<sup>②</sup>而内地的工业却相当薄弱,西康、青海、宁夏三省没有近代工厂,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七省的近代工业则仅占全国工厂的6.02%、资本总额的4.21%和产业工人数的0.79%。<sup>③</sup>抗战爆发后,军工业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先后遭到日军野蛮的破坏、占领和掠夺。西南、西北等内地则遭到严密的经济封锁。因而大后方军需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用品奇缺,经济极其困难。正是在这种新式工业一时无法大量兴建,而原有的旧式手工业又难以满足战时军需民用物资激增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以手工业为主的因地制宜、就近取材、投资少、见效快的工业合作社的出现,立刻成为

<sup>①</sup> 陈翰笙,《中国合作史话》,《陈翰笙文集》,第197页。

<sup>②</sup>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中料》第一辑,第78—79页。

<sup>③</sup>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战时经济的重要力量。

各地兴建的工业合作社,用简陋的设备,克服种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的军需和民用物资。如西北工合主要部门1940年的月生产能力为:织棉布110万尺,毛呢9630尺,棉毯7410条,军毯或毛毯35700条,棉巾7000打,丝绸19980尺;造织布机144台,织袜机及背心机35台,弹毛机11部,蒸汽机2部,木炭动力9部;制底皮2270张,面皮3480张,绵羊皮4350张;制军服15120套,长短筒袜12240打。<sup>①</sup>整个抗战期间,工合制造了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及农具共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万平方码,军用毛毯150万条,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00余万件。<sup>②</sup>这些物资一方面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直接支援着抗战事业,同时,又不断销往后方市场,满足内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正如宋庆龄向世界各地的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介绍工合的重要作用时所指出,“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即令日本完全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经济不稳定。”总之,“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sup>③</sup>它成了战时中国经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其次,工合运动有助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增强了前线作战部队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

国民党政府对工合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统区。它拨的经费,几乎全部是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所得贷款却仅占四百分之一。<sup>④</sup>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政府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对工合运动也由支持到应付,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工合活动加以歧视和压制,但是,在致力于工合运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解放区的工合运动终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解放区工业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外捐款和边区政府及银行的贷款。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西北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汇交解放区。仅1940年初这一次,斯诺就将在马尼拉募得的10万元捐款,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的毛织工合事业。<sup>⑤</sup>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陈翰笙,也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促进了解放区的工合事业的发展。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有41个工业合作社,1041名社员,入股资金从1941年的法币669314增加到3434040元,月产量为:270条毛毯,600条棉毯,14493包色布,2466色粗布,1325双毛袜毛鞋,1500顶毛帽,325只羊毛袋,30000条肥皂,

16796包牙粉,3250市斤面粉,1400磅豆粉,6000磅植物油,3888磅盐,257箱纯碱,605磅酒精,2043磅粉笔,5250瓶墨水,550000张纸。<sup>⑥</sup>这些产品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解放区的工合还拥有一些铁矿、煤矿、制造厂、铁工厂、制药厂、运输站和油井等行业。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已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

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大批产品。1939年,宋庆龄曾委托西北工合承制万件棉衣,由宝鸡、西安等地的工合组织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sup>⑦</sup>工合还将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迁到解放区。一次,艾黎从毛泽东处了解到晋西北贺龙部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就想方设法,从晋东南把一个炼铁合作社迁到晋西北。对于工合给予解放区的大力帮助,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sup>⑧</sup>

工合对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很大的帮助,工合浙皖办事处在兰溪,距皖南的新四军驻地较近,这为把工合办到新四军驻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战,工合浙皖办事处主动同新四军联系,要求新四军派人参加工合工作,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先后派叶建明等前往工合工作。1939年10月,工合在新四军皖南根据地的中心泾县茂林镇办起了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其中还有残疾军人组织的雨具合作社。合作社的产品,主要是供军需之用,如用于印刷《抗战报》和文件的纸张等。<sup>⑨</sup>艾黎还两次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工合在皖南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新四军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叶挺曾赞誉说“皖南工业合作社给予我们重要的援助,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以生产自救。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因此,我

① 《西北工合通讯》第八卷,第12期。

② 季崇盛:《中国合作事业概述》,《经济周报》第三卷,第二期,1946年7月11日。

③ 《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④ 《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⑤ 《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⑥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英文版),1943年重庆。

⑦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19页。

⑧ 《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30页。

⑨ 蒋传源:《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38页。

们能够抵挡敌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sup>①</sup>

其三,工合运动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援的援助,提高和扩大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影响。

工合在兴办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外国人士的鼎力相助。英国大使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都给予热情的支持。特别是英国大使卡尔,曾亲自赶到武汉,把兴办工合的计划面呈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并向他们专门作了介绍,力促国民党政府支持工合运动开展。<sup>②</sup>工合运动蓬勃兴起之后,进一步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密切关注。1939年底,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时,香港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亲自担任该会的主席,由于他一向同情中国抗日,不断宣传中国抗战和工合对抗战的贡献,还享有“红色主教”之誉。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英国合作专家戴乐仁对工合也给予积极支持,帮助制定了工合社的组织章程和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并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埃文斯·卡尔森、普律德女士等外国友人也都担任过该委员会委员。

为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工合国际委员会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斯诺夫妇亲赴马尼拉组建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普律德女士赴纽约,建立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民米兹将军任主席,陆军部长史门生等百余人任委员。美国促进会在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工合也十分关心,曾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斯诺对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作用和意义和介绍后,并表示要向蒋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强烈兴趣,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专门向蒋介石夫妇问起工合的发展情况。<sup>③</sup>英国工合促进委员会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表示英国在战时战后都希望同中国工合保持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联系。该公司推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的名誉主席,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任主席。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推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工合的捐款约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在内,海外

的捐款总额共计为500万美元。<sup>④</sup>这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

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是相互的,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西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曾为滇缅路的盟军制造帐篷、降落伞、行军床等军需品,修理卡车、吉普车等军用车辆,修筑道路、机场和建造临时住房等军事设施,有力地支援了盟军的军事活动。<sup>⑤</sup>工合的这种朝气蓬勃,同心协力的精神也传遍了世界。埃文斯·卡尔森负责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突击队就以工合飞行突击队命名。<sup>⑥</sup>

其四,工合运动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这不仅是当时工合运动中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合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把教育和生产、人才建设和工合发展联系起来。艾黎曾强调指出:“工合社如没有技术的协助和推进,今后的命运仍难免于自毁一途的。”“训练一班有技术能力的社员及职员是今天工合社刻不容缓的事情”。<sup>⑦</sup>最先开展起工合运动的西北地区,从组社之始,就注意到合作社年轻徒工的培育训练工作,曾先后在宝鸡、兰州、天水、西安等地组织短期技术训练班多期,训练内容主要是生产技术的操作。工合在全国各地兴起之后,各地区的工合组织也都纷纷办起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讲习班,培养和训练熟练工人,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还在成都办起过一个工合研究所,主要从事工合业务的理论和实际的研究工作、出版有关的书籍刊物,训练各地区开展工合的骨干。工合还建立了培黎工艺学校。该校学制2至3年,学员实行半工半读制度。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习文化业务知识,如中文、英语、地理、会计、实用机械、制图、机修、测量、冶金等;另一方面自己动手修建校舍、安装机器、开辟教学和生产基地、建立实习工作科目的车间,如精纺、织布、印染、造纸、机器复印、制革、缝纫、玻璃制造及工具制造等。<sup>⑧</sup>培黎工艺学校

<sup>①</sup> 路易·艾黎:《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sup>②</sup>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三集,第68页。

<sup>③</sup>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9—170页。

<sup>④</sup> 卢广缙:《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26页。

<sup>⑤</sup> 同上,第124页。

<sup>⑥</sup> 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第208页。

<sup>⑦</sup> 路易·艾黎:《“工合”的技术训练问题》,《中国工艺》第23期。

<sup>⑧</sup> 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第206页。

# 中国人民抗日史上的壮丽篇章

##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陈祥元 杨雪芳

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在过去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曾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而前仆后继地开展斗争，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南京条约之后的一个划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不仅使中国丧失面积为 35961 平方公里的台、澎、辽诸岛（比比利时王国还大出 5 千多平方公里），而且其赔款总数达 2.8 亿两银（折合今日人民币 130 亿元），大大超过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历年对外赔款总和的 4 倍以上。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包括台湾在内的 18 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提出的拒绝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项主张。台湾全省“哭声震天”。《台湾人民抗战檄文》发出号召，只要碰到李鸿章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台北人民拥到台湾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台中、台南一带人民发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言，每天都有数以千计人民群众自愿投军杀敌，欲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清政府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专使，到台湾办理割台事宜。同时，令台湾的大小官吏陆续撤回内地，甚至无耻地让日军到台湾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是，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刚一登陆，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反抗。台湾同胞纷纷组成义军进行反割台斗争，在全台燃起了抗日烽火，其声势之浩大，抵抗之强烈，完全出乎日军统帅部的意料之外。日本侵略者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之后才攫取

了台湾。

当时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冒违君之罪”，抗旨不内渡，“愿合众志成城，制挺胜敌”，担起了领导全岛抗日的重任。他率领台湾军民在内缺饷械，外无支援的情况下，浴血抗战达 5 个月之久，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伤亡 32300 多人，约占侵台日军的一半，远远超过了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数字。侵台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即被抗日义军砍伤致命。这场反割台斗争，固然是由刘永福领导的，但英勇牺牲坚强不屈的是人民组织的义勇军。尽管台湾沦陷了，但人民保卫台湾的斗争留下了一页光辉的历史。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到日本投降时为止，其抗日斗争可分为 5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期，即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抵抗时期，前后达 7 年之久。1895 年 10 月日军宣告“全台镇平”后不久，台湾各地游击队蜂起，继续坚持武装抗日。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军军营，袭击日军官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人物。

自日本统治台湾后，爆发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林大北起义。林大北是台湾宜兰人，曾参加过反割台斗争。1895 年 10 月 21 日台南失守后，他收编抗日武装残部，于同年 12 月 20 日攻打宜兰，打响了日军宣布“平台”后的第一枪。接着，新竹胡阿锦、金包里许绍文、淡水简大狮、台北陈秋菊、基隆林李成，龙潭坡江振源、三角涌王猫研、桃园陈瑞荣等先后起义的

前后培养出中等技术人才六七百人。这些人才不仅成不当时工合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也为战后的经济建设起了骨干作用。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的许多企业，包括玉门、大庆这样的国家重点企业，都有工合培黎学校的毕业生从事技术性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工合运动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力量和规模顿时衰减下来。到解放前

夕，唯有培黎工艺学校还硕果仅存。1952 年该校改名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由政务院重工业部直接领导。同年，工合总会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由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接管其全部档案和财产。这样，抗战时期轰轰烈烈开展的工合运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